

可喜的探索與突破

——評劉宓慶著《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

黃燕堃

香港嶺南學院

當代對比語言學研究深受傳統的方法論局限，六、七十年代以來更深受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法的影響，大都採用從形式到形式的類型學（typology）方法進行語言之間的對比。美國的語言學家 C.P. Corder 在他的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一書中就曾對英、德、法語之間的名詞數加以比較：

Comparison of number systems in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English	German	French
mass		some money	<i>etwas Geld</i>	<i>de l'argent</i>
		some furniture	—	—
plural		some tables	<i>einige Tische</i>	<i>des tables</i>
		some children	<i>einige Kinder</i>	<i>des enfants</i>
countable	dual	both boys	<i>beide Jungen</i>	—
		either boy	—	—
nonplural	sing	a table	<i>ein Tisch</i>	<i>une table</i>
		a child	<i>ein Kind</i>	<i>un enfant</i>

(頁232)

當然，對印歐語這類形態語言而言，採用從形式到形式的方法進行表層結構的對比還是有意義的，對教學和語言應用也有一定的幫助，例如介詞及限定詞（both，either 等）的用法可以採用對比方式進行教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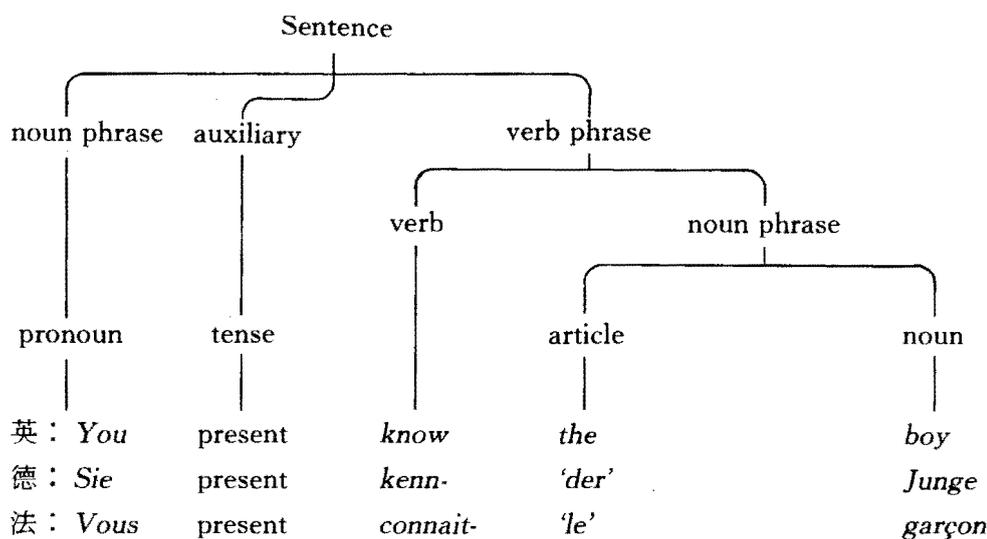
英語	德語	法語
both tables	<i>beide Tische</i>	<i>l'une et l'autre table</i>
either table (exclusive)	<i>entweder der eine oder der andere Tisch</i>	<i>l'une ou l'autre table</i>
at ei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nclusive)	<i>auf der einen und der anderen Strassenseite</i>	<i>à l'un et l'autre côté de la rue</i>
neither table	<i>weder der eine noch der</i>	<i>ni l'une ni l'autre table</i>

andere Tisch

at each side of the street	<i>auf beiden Strassenseiten</i>	<i>à chaque côté de la rue</i>
on each wall of the room	<i>an jeder Wand</i>	<i>sur chaque mur</i>

(頁232-233)

正因為如此，從微觀結構（例如以上兩表）到宏觀結構（語段）的對比可以給翻譯帶來形式對應模式：



(頁238)

不僅如此，還可以運用 Chomsky 的轉換生成法則，英、德、法之間可以生成轉換成形式上完全對應的疑問句，從而有可能確立某種翻譯規範。例如

Yes/no question transformations

- 英語：1. You + present + know ⇨ present + you + know —
 2. Present + you + know ⇨ Do + you + know —

Yes/no question transformations

- 德語：1. Sie + present + kenn- ⇨ present + kenn + Sie —
 2. Present + kenn- + Sie ⇨ kennen + Sie —

Yes/no question transformations

- 法語：1. Vous + present + connait- ⇨ Est-ce-que + vous + present + connait-
 2. Est-ce-que + vous + present + connait- ⇨ Est-ce-que + vous + connaissez —?

(頁239)

可是這樣的對比，對屬於不同語系的語言（例如漢、英語）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僅止於認識它們之間的差異，與意義掛不上鉤。這是因為漢、英的語法體系有較大的

差異。英語具有形式上相當穩定而嚴格的規範性，而漢語的靈活性很大。漢語是一種不具印歐語式的形態變化（例如動詞的形態變化體系）機制的語言，語法的意義由詞匯手段表示。因此類型學裏這種形式對比，對漢、英雙語的研究意義很有限。也許這正是近年來漢、英對比研究進展不大的原因。今年1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劉宓慶著《漢英對比研究與翻譯》一書在這方面進行了可喜的探索，並有所突破。作者擺脫了傳統的類型學表層對比方法論的局限和束縛，緊緊地把握住漢語是非形態語言（non-inflected language）的特點，指出：「語言都具有語法規律，語法規律通常受該語言的表現方法的制約，表現方法又通常受操這一語言的羣體的思維方式的支配。」因此，語言對比不能「掐頭去尾」，只能在語言形式範圍內作類比，擺脫不了類型學的方法論（typological methods）的局限性，從而提出了：「對翻譯的應用理論而言，語言特徵和思維方式也正是我們應該研究的三個層級。」（第一章第1.0節）總之，對比語言學應把握的是層次對比方法論。該書作者根據這一指導原則，在各層次的對比中，分別用圖表（Schema）列出對比範疇內漢、英語之間的差異，進行詳細的闡述與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翻譯過程可採取某些相應的對策，不致盲目翻譯。相信這樣不論對翻譯工作者或從事翻譯教學的人都有指導意義。

分層對比、由表及裏、落實到應用是該書的基本特色。作者對書中每一個題目的論述都遵循「從表層出發，探討表現法，再深入到思維方式」這一層層深入的原則。例如在被動語態一章中，作者提出了典型的漢語例句：「衣服洗好了。」這是一個表層結構，其深層結構是「衣服（S）被（施事者）洗（V）好了（C）」。這種轉換就是漢語語法中所謂「受事施事化」（第七章第7.1.1節）。同時作者指出這個結構反映了漢語的「隱性被動語態」表現法，其特徵是漢語主、被動的定界隱含化、模糊化。這樣的表現法是漢語受事施事化的結果，可見句法體現與之相適應的表現法；而這種表現法正好反映了漢語主語的主題化（話題化）的傾向。這就是說，在以漢語為母語的人的語言心理過程中，信息中心是一個「話題」，而話題如果是一個邏輯上的賓語，那麼，賓語就取主位前置式（thematic fronting），即與漢語強調主位詞的話題性（topicality）原則結合，使動詞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地以主動形式出現，而不必以被動的形式出現。在此基礎上，再以思維方式作深層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漢語多用主動式顯然是受中國傳統思維中的主體意識的影響（第13章第13.1.3節）。被動行為以主動形式出現，被動語態隱含，行為者則「盡在不言之中」：說話者提出一個話題（衣服），隨即以自己為主題對此進行描述（洗好了），至於「誰洗好」的，在漢語的思維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明「衣服」的狀況。同樣，如果說話者認為「誰洗好的」是重要話題，必然會採取另一種句式：「衣服我已經洗好了」，形成了主語並列（話題+施事主語）。這時儘管「我」也可能是「他」、「她」、「媽媽」等等，都屬於說話者以自己為主體對話題進行描述——「洗好了」。總之，漢語的受事施事化表現法是思維方式的差異，從而使漢、英被動句也呈現明顯的差異，並使說英語的人產生漢語「非邏輯化」的印象。除了「隱性被動」以外，作者還提出了漢語的「顯性被動」和種種「半隱性被動」式。這樣，一向被認為複雜紛紜的漢語被動語態問題，

就有了一個既符合漢語事實，又做到由淺入深、由表及裏的解釋。

作者思路開闊，在書中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確實有助於讀者瞭解漢、英雙語的素質不同，翻譯時必須「對症下藥」，與印歐語之間的轉換大不相同。其次，作者除了採取層次對比分析法，力求突破淺表層類型學方法論外，還做到了保留類型學對比法的積極面，即廣泛地注重語言現象的結構特徵、形式特徵，並沒有忽視類型對比。譬如：在論述漢、英的基本句結構特徵時，作者提出了漢英基本句的擴展（expansion）具有不同的型式，使漢英語段結構產生了不同的特徵。漢語基本句具有句首開放性（open beginning）和句尾收縮性（contracting ending），或封閉性（closed ending）。而英語句子則恰恰相反，具有句首的封閉性和句尾的開放性。這種類型對比可以說明現代漢語句子「強逆性延伸力」（RL式）與「弱順性延伸力」（LR式），找出了漢語句子必須簡短的原因。（頁122—125）。例如：英語句子 This is the cat. 後面可以一再加上以 that 引導的定語從句加以擴展；而漢語的句子則具有從右到左（RL）的「逆綫性延伸力」。如「照顧得好好的」可以逆延伸為「他把一切照顧得好好的」、「沒想到他把一切照顧得好好的」、「我真沒想到他把一切照顧得好好的」等等。句首是開放的，而句尾則很難再延伸，一經延伸必定突破了基本句結構而另成一句，構成了語段（text），形成了漢語的板塊型流散式語段。翻譯時，我們必須以語段為單位，一個語段、一個語段地組織英語句子。作者還很有創見地提出了英語句子的形式主軸是 SV（subject verb）提挈機制，以 SV 各不可或缺的部件提挈所有的英語句子；而漢語是意念機制。也就是：如果說英語句子必須以 SV 來統領全句，任何英語句子都不可能擺脫 SV 的提挈作用的話，那麼漢語則是以說話者的意念為主軸，將意念表現為詞組（語義支點）和較短的分句（語義板塊），形成長短相間、單複交替（詞組與分句交替）的句段流（頁114）。漢語句子的主語和謂語關係非常鬆散，不存在英語式的 concord（一致性）；但主謂關係又非常複雜（第二章第2.1.1節），因為漢語的主語遠遠沒有英語主語那麼重要，它常常只是一個話題，實在稱不上是「一句之主」，譬如：「臺上（話題）坐着主席團」，「臺上」與「坐」沒有甚麼密切關係，「坐」是主席團的行為。有些鬆散的主謂關係則是由於漢語的主語並不是行為者（施事者），而是受事者，如「雞不吃了」，「雞」是「吃」的賓語，是受事主語。這樣就給我們的翻譯帶來一個主語轉換的問題（第2章第22節）。正是基於這種對比分析，該書的作者認為對比語言學實際上是為翻譯提供對策的一門應用語言學。研究翻譯，非深入研究對比語言學不可，是翻譯理論的基礎科學（《緒論》第0·1節）。

目前，很多翻譯理論和對比語言學的論著的作者都是西方研究者，他們的研究方面和對比的語言又大都是印歐語，系統地對比研究漢、英語及探討雙語轉換問題的論著似乎還不多見。因此，在翻譯界中有些人認為翻譯理論對實際的翻譯工作沒有甚麼特別的幫助，解決不了實際問題。這本論著可以說回答了這個問題，而且為我們提出了很多新的課題，使人耳目一新，也促使更多人投入這個新的開發領域。對翻譯工作

者及從事翻譯教學的人士來說，這一部論著可以作為我們的教科書和參考書，也可以作為我們研究的起點。

當然，由於這是一本比較系統的著作，涉及的問題很多，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尚待改進。書中有些問題似乎並沒有談透，產生混淆，如漢語的緊縮式謂語與連動式究竟有甚麼區別？從所舉的例子上看，似乎都是連動式謂語。對於語法歧義，作者的觀點不很鮮明，認為既是歧義就不作斷言。在詞的對比和翻譯一節中，談到英語 Ms（用在不表示婚姻狀況女性名字前）一詞時，作者認為在漢語中也缺乏所指。實際上，Ms 在漢語是有所指的，通常譯作「女士」。在香港，這一詞使用十分普遍，大概包括三種情況，一種是結了婚的婦女，但不使用丈夫的姓氏；另一種是未結婚或準備獨身的婦女，但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婚姻狀況；還有一種是對不明婚姻狀況的婦女的稱呼。此外，有些句子的翻譯尚可改進，而且印刷錯誤太多，校稿工作沒做好。據說，作者已與中文大學翻譯系系主任 David E. Pollard 教授分別重新審校了英漢雙語部分，此書將在香港再版發行。相信新版的《對比》一書的質量會有進一步的提高。

主要參考書：

C. P. Corder (1973),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N.Y.

F. Guenther et al. (1978), *Meaning and translation*, Duckworth, U.K.

V. P. Clark et al. (1985), *Language Introductory Readings*, N.Y.

（上接24頁）

近幾年來，我們的教學實踐告訴我們，應該讓中學生掌握粵語音韻的基本知識。它並非「絕學」、「難學」，學生也並非沒有興趣或沒有能力學。最關鍵的是，我們在講授過程中必須善於化難為易，由淺入深，注意趣味性和實用性。讓學生在學習中得到樂趣，嘗到甜頭，收到實效；那麼，粵語音韻這門「難學」也會變成「易學」，學生的「苦學」也會變成「樂學」了。